

功能與源流： 二里頭文化鑲綠松石銅牌飾研究

黃翠梅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提 要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是二里頭文化最令人注目的內涵之一，本研究首先根據二里頭遺址發掘的三件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與擺放方向，推測它們的使用方式，其次梳理考古與傳世所見十七件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的紋飾特徵與類型演變。

研究結果顯示，二里頭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是佩戴在墓主手腕上的飾品，其源頭或可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鑲綠松石腕飾，至於十七件鑲綠松石青銅牌飾之所屬年代應大致涵蓋二里頭二至四期以迄商代前期，並可依其製作工藝和紋飾構圖之別，區分為前後相續的五組，其中又以第一組二里頭二期墓葬（81YLV4）出土者年代最早，器面鑲嵌的匍匐獸紋表現也最為完整精緻，而後隨著時間的發展，伏獸紋愈趨鬆散簡化，並最終抽象化成幾何形鏤空框架。

關鍵詞：二里頭、天水、三星堆、鑲綠松石青銅牌飾、腕飾、圖像範式

前 言

綠松石製品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出土數量眾多，種類包括珠、管、墜飾以及鑲綠松石的動物紋青銅牌飾等，其中又以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最為引人注目，並且已累積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惟學者間不僅對於鑲綠松石動物紋牌飾上裝飾紋樣的辨識及其分類方式各有不同主張，對於牌飾之功能與象徵的解讀也缺乏共識，顯示眾所矚目的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尚有許多謎團待解。

有鑑於此，本研究擬從二里頭墓葬出土的三件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出發，首先根據墓中隨葬品的出土位置與青銅牌飾的擺放方向推測其佩戴方式與使用功能，進而探討它們與新石器時代末期出現的鑲綠松石腕飾的可能關係；其次分析考古與傳世所見十七件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的紋飾特徵與類型區分，並嘗試建立各類型牌飾間的演變序列。

一、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及其配戴方式

迄今為止，二里頭遺址共出土了三件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它們分別發現於 81YLV4、84VIM11 和 87VIM57 等三座墓葬中。

二里頭 81YLV4 屬二里頭文化二期偏晚，¹ 是一座南北向的豎穴土坑墓，長 2.5 米、寬 1.16 米、基底距地表深 2.1 米，基底鋪一層硃砂，棺木外表飾有朱紅色漆，墓主骨架朽腐無存。墓中出土隨葬品共十四件，包含二件銅器、五件漆器、四件玉石器和二件圓陶片等（圖 1），葬品質量為同區墓葬中為最豐富者。鑲綠松石青銅牌飾（81YLV4：5）呈上寬下窄的弧瓦狀圓角束腰梯形，長 14.2 厘米、最寬處 9.8 厘米，左右側緣各有二個穿孔鈕。牌飾正反二面一凸一凹，凸面由許多形狀各異的綠松石片鑲貼排列成獸形紋飾（圖 2），凹面附著麻布紋。簡報描述此器出土時凸面向上「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略偏左」，² 其東側近旁另有一組銅

1 依最新的系列測年結果，二里頭文化的年代大致介於西元前一七五〇年至一五三〇年之間，然而許宏認為其年代上限應可上推至西元前一八〇〇年，年代下限則可能達到西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其中二里頭文化一期大約落在西元前一八〇〇年至一七〇五年之間，四期大約為西元前一五六五年至一五〇〇年，二、三兩期的年代則介於一期和四期之間。參見許宏，〈「夏王朝」考古：學術史·新動向·新思考〉，《夏商都邑與文化（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 16-17。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1981 年河南偃師二里頭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84 年 1 期，頁 37、40。

鈴及玉鈴舌。³

二里頭 84VIM11 屬二里頭四期，是一座南北向的豎穴土坑墓，長 2 米、寬 0.95 米、基底距地表深 1.10 米。發現時墓主骨架已朽，僅餘齒牙數枚。隨葬品共二十七件，包含銅器三件、漆器一件、玉石器八件以及陶器和海貝等（圖 3），葬品質量較同區其他墓葬豐富。⁴ 鑲綠松石青銅牌飾（84VIM11：7）形制與 81YLVM4：5 類似，呈上寬下窄的弧瓦狀圓角束腰梯形，惟尺寸略大，全長 16.5 厘米、最寬處 11 厘米，左右側緣各有二個穿孔鈕。牌飾正面（凸面）鑄有突起的邊框及獸形輪廓，其中整齊有序地嵌入數排長方形綠松石片（圖 4）。簡報指出此青銅牌飾出土時凸面向上「置於墓主人胸前」，⁵ 其西側近旁亦有一組銅鈴及玉鈴舌，漆盒則出於墓底南端。此外，因發掘簡報又有「漆盒位於墓主足端」的記載，可知墓主頭向應是朝向和漆盒相對的北端。

二里頭 87VIM57 同屬四期的南北向豎穴土坑墓，長 2 米、寬 1.05 米、墓坑深 0.35 米，基底鋪有一層硃砂。發現時墓主骨架已朽，發掘者據墓中穿孔貝殼項飾與綠松石珠擺放位置推測墓主人頭向北。墓中隨葬品共二十五件，包含銅器四件、漆器一件、玉器八件、大量小綠松石嵌件以及陶器和海貝等，葬品頗為豐富（圖 5）。⁶ 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87VIM57：4）形制亦呈上寬下窄的弧瓦狀圓角束腰梯形，器長 15.9 厘米、最寬處 8.9 厘米，左右側緣各有二個穿孔鈕。器身以青銅鑄成獸紋鏤空框架，正面嵌以外形不一但排列整齊的綠松石片（圖 6），背面不見依托之物。出土時置於墓地東側中部，其西側近旁亦有一組銅鈴及玉鈴舌。⁷

自從第一件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在一九八四年正式發表以來，有關其使用功能即引起諸多推測。然因受限於考古發掘品的數量不足，且三座出土動物紋青銅牌飾的墓葬中皆屍骨無存，因此多數學者僅能根據牌飾的出土位置及其與墓壁間的相對距離，推測它們是配戴在墓主胸前的飾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里頭 84VIM11，因為該墓葬的平面圖和墓葬局部彩圖均是以南上北下的方向發表，與其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1981 年河南偃師二里頭墓葬發掘簡報〉，頁 37-38。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1984 年秋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 年 4 期，頁 319、323。

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1984 年秋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几座墓葬〉，頁 320。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1987 年偃師二里頭遺址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92 年 4 期，頁 294。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1987 年偃師二里頭遺址墓葬發掘簡報〉，頁 294-295。

他二墓平面圖北上南下的方向不同，以致後續研究者多誤判墓主躺臥方向為頭南足北，甚至據以對動物紋青銅牌飾的功能做出特定解讀。⁸

但是，如果我們在各墓的平面圖和墓內彩圖上模擬一位身高約 170 公分的墓主可能躺臥的位置，再綜合考量墓中各隨葬品的相對位置、牌飾上寬下窄的橢方外形、其左右兩側上下並置的穿綴孔以及牌飾背面的絲織物痕跡等，便可推知前述三墓之墓主應係躺臥於墓坑一側，而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則以上寬下窄、凸面向上的方向置於墓主左側或右側手腕附近（圖 7-10）。換言之，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原應為縫綴於墓主左手或右手下臂至袖口處的腕飾，至於附有鈴舌的銅鈴則是佩掛在與青銅牌飾相對一側的腰間。

二、二里頭以外地區出土的鑲綠松石牌飾及腕飾

目前具有明確出土地點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除了來自二里頭遺址外，也見於甘肅天水 and 四川廣漢的三星堆遺址。

天水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長約 15 釐米、寬約 10 釐米，形制與二里頭各器類似，呈上寬下窄的弧瓦狀圓角束腰梯形，左右側緣各有二個穿孔鈕。由於原嵌於牌飾正面（凸面）紋飾周圍的綠松石片多數已經脫落，因此可以清楚見到青銅底托上突起的牌飾邊框及獸形鑄紋。

該器目前陳列於的天水博物館（即天水伏羲廟）中，筆者於二〇〇九年參訪該館時，該器的說明牌上僅簡單寫著「車飾 / 戰國 / 秦州出土」三行九字（圖 11），其餘出土狀況均未見報導。張天恩曾經主張天水出土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可能與齊家文化有關，因此它的出現反映了中原夏文化和西北地區齊家文化間曾經存在密切的交流關係。⁹

三星堆遺址先後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八年發現青銅牌飾，有關它們的出土情況也有比較詳細的報導。

一九七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以西的高駢公社製磚瓦廠在挖掘排水溝時，曾經在距地表 75 公分處發現三件玉器（玉戚、殘玉璋和矛狀玉器）和一件鑲綠松石青銅

8 王青，〈二里頭遺址出土鑲嵌綠松石牌飾的初步研究〉，《夏商都邑與文化（二）》，頁 263。

9 張天恩，〈天水出土的獸面銅牌飾及有關問題〉，《中原文物》，2002 年 1 期，頁 43-46。

牌飾，其中青銅牌飾器長 12.3 厘米、最寬處 5 厘米，¹⁰ 形制為上寬下窄的弧瓦狀近長方梯形，上緣圓凹、下緣圓凸，器身鑄有左右對稱的幾何鏤空紋飾，其中鑲有綠松石，可惜此件青銅牌飾迄今僅有簡略的線圖發表（圖 12）。

另一九八八年三星堆東北部真武村的民工在一處名為倉包包的高地上取土時，也在距離地表約 65 至 85 厘米處發現了玉鑿、玉箍形器、玉璧等玉石器和三件青銅牌飾。這三件青銅牌飾的形制皆為上寬下窄的弧瓦狀圓角梯形，一件器面平整無紋，另二件則分別在中軸兩側鑄出左右對稱、向上斜出的框架（圖 13）或斜 S 形鏤空（圖 14），其中前者在發現時部份鏤空部位尚留有綠松石鑲嵌。¹¹

因於三星堆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均出於土坑之中，且同坑又有其他玉石器共出，一般認為出土地點應為祭祀坑。¹² 此外，多數學者根據三星堆鑲綠松石青銅牌飾較具原始性的鑄造工藝，與牌飾共出的玉戚、殘玉璋和大小有序的玉璧等玉石器，以及三星堆遺址曾經出土與二里頭文化相近的陶盃等器物，判斷前述三件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的年代應介於二里頭文化三期至商代前期之間，¹³ 至於它們在入坑前是否也是作為腕飾使用則不得而知。

事實上，除了二里頭遺址外，鑲貼綠松石的腕飾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約西元前二〇〇〇年前後）的墓葬也可以發現。例如，青海的宗日遺址 322 號墓葬（圖 15）、¹⁴ 晉南地區的陶寺文化下靳遺址 76 號墓（圖 16）、136 號墓¹⁵ 和另一座不明墓別的墓葬（圖 17），¹⁶ 以及山東地區龍山文化日照兩城鎮遺址 33 號墓（圖 18）中都可以見到墓主手腕佩戴鑲有綠松石的飾品。¹⁷ 筆者認為，二里頭遺址多源性的文化內涵不僅體現在冶金工藝的出現以及青銅兵器、陶質禮器、原始瓷器、玉質兵

10 敖天照、王友鵬，〈四川廣漢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 年 9 期，頁 76。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三星堆遺址真武倉包包祭祀坑調查簡報〉，《四川考古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 80-81。

12 趙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李紹明、林向、趙殿增主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成都：巴蜀出版社，1993），頁 82。

13 杜金鵬，〈廣漢三星堆出土商代銅牌淺說〉，《中國文物報》，1995 年 4 月 9 日第三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三星堆遺址真武倉包包祭祀坑調查簡報〉，頁 89；趙殿增，〈三星堆與二里頭銅牌飾研究〉，頁 124。

14 陳洪海、格桑本主編，《宗日遺址》（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頁 15。

15 下靳考古隊，〈山西臨汾下靳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98 年 12 期，頁 9-12、封面彩圖 1、2。

16 該綠松石腕飾現藏於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陳列室，二〇一四年十月承蒙謝堯亭所長陪同參觀，並於近日同意筆者發表相關照片，特此申謝。

17 該件腕飾出土於墓主左臂處，係由綠松石和玉珠組合而成，現藏於山東大學博物館。

器和半月形雙孔石刀等器物的使用上，¹⁸也表現在綠松石飾品的裝飾和佩戴上。這些新石器時代末期的綠松石腕飾雖然不具有金屬底托或外框，器面也不見獸形裝飾紋樣，但是它們以綠松石片鑲貼排列成腕部裝飾的工藝技法和審美設計，對於瞭解西元前二〇〇〇年前後黃河流域以綠松石裝飾人體的風氣與其形成背景，以及追溯二里頭文化鑲綠松石牌飾的起源，仍可提供相當有力的助益。

三、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的紋飾特徵及發展脈絡

除了前述二里頭、天水和三星堆遺址的出土品外，目前已知海內外各公私機構或個人收藏較具代表性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大約有十餘件，其中五件收藏於美國的銅牌飾早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即已被陸續發表，但多被誤認為是用來裝飾馬隻前額的飾品（即「額前飾」frontlets），時代則被定為商代。¹⁹直到二里頭牌飾出土以後，目前收藏在美、英、瑞士、日、中等各地的流散品才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至今已有多位學者撰文介紹。²⁰此外，隨著材料的累積，有關二里頭文化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的專題研究也快速增加，²¹諸研究中除了針對各件鑲綠松石青銅牌飾上的

18 許宏，〈二里頭的「中國之最」〉，《中國文化遺產》，2009年1期，頁61-62、65-66。

19 Osyald Siren, *Kinas Konst Under Tre Artusenden* (中國藝術三千年) (Stockholm: Natur och Kultur, 1942-43), vol.1, pl.21, illus. 44; Max Loehr, *Relics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r. Paul Singer* (New York: Asia society, Distributed by Harry N. Abrams, 1965), 44, fig.19; Asia Society, *Archives of Asian Ar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8-69), XXII, 129; Harry M. Garner and Margaret Medley, *Chinese Art in Three-Kimensional Colour* (Portland: Asia Society for the Gruber Foundation, 1969), vol.1, 146; Fogg Art Museum, *Grenville L. Winthrop: Retrospective for a Collector*, Cambridge of Massachusetts: Fogg Museum of Art, 1969, 43, 151; Robert J. Poor,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Ceramics and Jad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Introduction and Catalogue* (Honolulu: The Academy, 1979), 48.

20 李學勤，〈論二里頭文化的饕餮紋銅飾〉，《中國文物報》，1991年10月20日；MIHO MUSEUM 編，〈MIHO MUSEUM 南館圖錄〉（京都：日本寫真印刷株式會社，1997），頁167、圖77；李學勤，〈從一件新材料看廣漢銅牌飾〉，《中國文物報》，1997年11月30日；朱仁星，〈遺珍略影——檀香山藝術學院收藏中國文物選介〉，《故宮文物月刊》，113期（1992.8），頁50-51；趙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頁82；杜金鵬，〈廣漢三星堆出土商代銅牌淺說〉；張天恩，〈天水出土的獸面銅牌飾及有關問題〉，頁43-46；張昌平，〈玫茵堂收藏的二里頭文化青銅器〉，《南方文物》，2014年3期，頁154、彩圖三。

21 王金秋，〈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牌飾〉，《中原文物》，2001年3期，頁18-21；葉萬松、李德方，〈偃師二里頭遺址獸紋銅牌考識〉，《考古與文物》，2001年5期，頁40-47；陸思賢，〈二里頭遺址出土飾牌紋飾解讀〉，《中原文物》，2003年3期，頁38-43；趙殿增，〈三星堆與二里頭銅牌飾研究〉，《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21-128；王青，〈鑲嵌銅牌飾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5期，頁65-72；朱乃誠，〈二里頭文化龍遺存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4期，頁15-21、38；王青、李慧竹，〈國外所藏五件鑲嵌銅牌飾的初步認識〉，《華夏考古》，2007年1期，頁88-93；王青，〈鑲嵌銅牌飾的寓意諸問題再研究〉，《東方考古》，9集（2012），頁223-242；陳小三，〈試論鑲嵌綠松石牌飾的起源〉，《考古與文物》，2013年5期，頁91-100；王青，〈二里頭遺址出土鑲嵌綠松石牌飾的初步研究〉，《夏商都邑與文化（二）》，頁249-277。

動物原型進行考識外，也對於各種鑲嵌圖像進行分類，或梳理其先後發展關係，或詮釋其象徵意涵，惟無論是關於鑲嵌圖像原型的辨識、圖範類型的梳理或圖像意義的詮釋等主張，目前均未獲致具體共識。

圖像學研究，主要包含前圖範學辨識（pre-iconography）、圖範學分析（iconography）和圖意學詮釋（iconology）三個層次。²² 如果未能正確辨識圖範原型，就無法進行圖像意涵的詮釋，而對圖範原型的掌握，則又有賴正確的構圖與形式分析以及圖範傳統的梳理。因此，本文將以十七件青銅牌飾（包含考古發掘品和海內外流散品）為依據，首先分析牌飾上各種紋飾的構圖特徵及圖範原型，再嘗試梳理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的形制類型與發展脈絡，至於裝飾紋飾的圖意學詮釋，則留待日後另闢專文探討。

這十七件青銅牌飾除了前述二里頭遺址的三件、天水出土的一件和三星堆遺址出土的三件外，還包括現藏於美國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Museum）的三件、美國保羅辛格醫師（Dr. Paul Singer）收藏的二件、英國倫敦古董商 Eskenazi 收藏的一件、瑞士玫茵堂的一件（原屬紐約古董商 Eskenazi）、檀香山藝術學院的一件、日本美秀（Miho）博物館的一件，以及二〇一三年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新入藏的一件，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為首次發表。

在這些青銅牌飾中除二里頭墓葬出土的三件所屬年代明確外，其餘十四件年代歸屬不明。而除了沙可樂博物館 2 號牌飾外，這些鑲綠松石青銅牌飾均為上寬下窄的弧瓦狀圓角梯形，左右側緣亦各有二個穿孔鈕，筆者依其製作工藝和紋飾構圖之別，將之劃分為五組（圖 19）。²³

第一組一件（圖 19-①、圖 20），即二里頭 81YLV4：5 牌飾。此一牌飾長 14.2 釐米、最寬處 9.8 釐米，兩側束腰，器面由不同形狀和不同方向的綠松石片鑲貼作匍匐狀的獸紋，²⁴ 而表示不同部位的綠松石片之間則留有寬度 0.1-0.3 釐米左右的空隙作為輪廓。此外，為增加紋飾輪廓的流暢度，空隙兩側的綠松石片邊緣還可

22 Erwin Panofsky,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enaissance Art," in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26-41.

23 圖 19 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線圖來源，詳見本文各相關段落註解。

24 二〇〇三年陸思賢已經指出此件牌飾上的裝飾圖案「總體為匍匐狀動物紋，下面是頭部，頭部兩側是匍匐的前肢，上面是身部，身部外側是爬著的後腿」，筆者對此深有同感。參見陸思賢，〈二里頭遺址出土飾牌紋飾解讀〉，頁 38。

局部見到鑲貼後再行修磨的痕跡。²⁵

這件牌飾上的獸紋可以被區分為前、後二段：牌飾前段中間為獸首，獸面雙眼圓睜，雙眼下方為其口鼻，口鼻兩側留有髭鬚，獸首兩側則為獸屈折的前肢；牌飾後段以左右對稱的交纏旋紋表示獸身肩背至臀部的位置，旋紋兩側則為獸匍匐的後肢。此外，牌飾正中以長方形綠松石片自獸臀至口鼻部位依序排列，因此器面獸紋除可區分為前後兩段外，同時具有中軸式的構圖設計。類似二里頭這種帶有髭鬚且具有中軸式構圖的獸面紋飾，在早於二里頭時期的新砦遺址出土的陶器蓋（圖 21）²⁶ 以及發掘自二里頭三號基址南院屬於二里頭文化二期的 3 號墓葬出土的鑲綠松石龍形器上都可以見到，²⁷ 可知到了二里頭文化二期階段，獸面紋的形態已經大致定型。

第二組六件（圖 19-②），包含二里頭 84VIM11：7 牌飾（圖 22）、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的一件（圖 23）、保羅辛格醫師收藏的二件（圖 24、27）、英國倫敦古董商 Eskenazi 收藏的一件（圖 25），以及天水博物館的一件（圖 26）。這些牌飾的長度介於 14 至 17.2 釐米之間，最寬處大約介於 10 至 11.3 厘米之間，前四件兩側束腰，後二件兩側平直，形制與第一組差別不大，但裝飾工藝卻明顯有別。例如，牌飾正面四周鑄有凸起的邊框，框內為凸起的獸形輪廓，輪廓內外則平整有序地嵌滿數排長方形綠松石片。此外，不僅青銅底托背面有織品痕，部分牌飾在綠松石片和青銅底托之間還鋪墊一層織品，²⁸ 應與加強綠松石片與底托之黏合有關。

就紋飾的基本構圖而言，本組多數牌飾與第一組相近，惟各部位紋飾間的關係較為鬆散，動物造形也愈趨簡化。例如：獸紋的四肢已消失不見或與邊框合一；紋飾前段為獸首，獸眼基本為梭形，僅眼瞼轉折曲度略有變化，髭鬚或位於口鼻兩側、或自口鼻前方邊框歧出；紋飾後段為獸身，除比例明顯縮減外，第一組牌飾上

25 二〇一四年十月承蒙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朱乃誠主任惠允提供參觀二里頭 81YLVM4 出土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特此申謝。

26 顧萬發，〈試論新砦陶器蓋上的饕餮紋〉，《華夏考古》，2000 年 4 期，頁 76，圖 1。

27 李存信，〈二里頭遺址綠松石龍形器的清理與仿製復原〉，《中原文物》，2006 年 4 期，頁 92-96，封二：1-4。

28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第八十屆美國考古學年會（The 8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的第三十七場討論會上，Ariel O'Connor 和 Katherine Eremin 在以“A Technical Study of Casting and Inlay on Chinese Ceremonial Weapons at the Harvard Art Museums”為題的發言中，提及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收藏的三件鑲綠松石青銅牌飾在綠松石片和青銅底層之間均墊有一層織品。Ariel O'Connor and Katherine Eremin, “A Technical Study of Casting and Inlay on Chinese Ceremonial Weapons at the Harvard Art Museums,” *The 8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sian Art Museum, San Francisco, April 14, 2015).

表示獸的肩背至臀部的對稱交纏旋紋此時已簡化為蘑菇狀或掛勾狀紋飾，蘑菇紋的底部又與上緣輪廓連結，導致身首區分更為明顯。其中保羅新格收藏的 2 號牌飾的獸形紋比較特殊，器面以兩條平行直線自獸首頂部向上連接魚尾狀的獸身，惟其獸首表現以及自上下器緣歧出的雙勾紋仍可見到與同組牌飾間的聯繫。

第三組四件（圖 19-③），包括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的二件（圖 28-29）、瑞士玫茵堂的一件（圖 30）、以及檀香山藝術學院的一件（圖 31）。其中除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 2 號牌飾長 26.6 釐米、最寬處 12.2 釐米外，其他三件的長度介於 14.8 到 16.5 釐米之間，寬度則大約為 8 至 10 厘米之間，尺寸與前二組相近，鑲嵌工藝也與第二組基本相同，但牌飾的外形更為多樣，獸形紋飾的變化也更為明顯。

例如：牌飾前段獸面的雙耳向上延伸，而原見於第二組牌飾後段的蘑菇狀紋飾，也變形成尖桃狀、雙耳狀或羽狀紋飾，並不再與上緣輪廓相連，不僅獸首與獸身間的明確關係不再，原有的獸身也彷彿被獸的角冠所取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圖 27 沙可樂博物館 2 號牌飾前端為獸首，獸首上方有尖桃紋，但圓角梯形上緣輪廓中央尖出，梯形上方另有一個具雙勾紋飾的尖首圭狀突起，有如獸的尾部一般，整體造形與其他牌飾既有聯繫又獨樹一格。

第四組一件（圖 19-④），即二〇一三年國立故宮博物院新入藏的一件（圖 32），筆者曾於二〇一四年辦理提件參觀。²⁹ 此件牌飾長度 15 釐米，鑲嵌工藝與第二、三組相同，亦即先在牌飾正面鑄出凸起的邊框和紋飾，再於紋飾四周平整有序地嵌滿數排方形綠松石片。此外，在綠松石片和青銅底托之間亦可見到織品痕跡。至於牌飾上的獸形紋飾則又進一步省略，除了獸眼仍清晰可辨外，包括前段獸首和後段獸身均退化成末端向內勾折的 U 字形紋。³⁰

第五組五件（圖 19-⑤），包括二里頭 87VIM57：4 牌飾（圖 33）、日本美秀博物館的一件（圖 34），³¹ 以及三星堆倉包包出土的二件（圖 35-36）和高駢公社出土的一件。³² 其中二里頭和美秀博物館牌飾長度分別為 15.9 和 15 釐米，寬度為 8.9

29 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蔡玫芬處長和玉器青銅科張麗端科長陪同參觀並提供相關協助。

30 類似具有簡化獸面裝飾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亦可見於其他海內外私人收藏之中，惟因相關資訊發表有限，本文暫不討論。

31 MIHO MUSEUM 編，《MIHO MUSEUM 南館圖錄》（京都：日本寫真印刷株式會社，1997），頁 167 圖 77。

32 有關二里頭 87VIM57：4 牌飾或日本美秀博物館藏品與三星堆出土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的關聯性，杜金鵬、李學勤和趙殿增均曾論及。參見杜金鵬，〈廣漢三星堆出土商代銅牌淺說〉；李學勤，〈從一件新材料看廣漢銅牌飾〉；趙殿增，〈三星堆與二里頭銅牌飾研究〉，頁 124。

和 8.5 厘米，尺寸與前組各器大致相當，但三星堆牌飾的長度介於 12.3 到 14 釐米之間，寬度則只有 5 釐米上下，明顯小於他器。此組牌飾的裝飾工藝與前述四組有所不同，相對於前四組牌飾在密實的青銅底托上鑲滿或嵌滿綠松石片的做法，其器身以青銅鑄成獸形或幾何形鏤空框架，再於正面鏤空部位嵌入外形不一的綠松石片，牌飾背面則均無依托。從美秀博物館藏品背面尚存織物及木質痕跡推測，³³ 它們原應存在有機材質的底托。

此組牌飾中二里頭 87VIM57：4 和美秀博物館牌飾的前段大體仍可辨識出獸首輪廓，獸的雙眼或梭或圓，口鼻兩側亦留有髭鬚，而後段則排列成整齊的鱗狀紋，這種垂直並排的紋飾構圖很可能是從第三組檀香山藝術學院牌飾獸面上方的羽狀紋發展而來。至於三星堆倉包包出土器上的裝飾則又進一步抽象化成幾何形獸面紋，其中 87GSZJ：36 以青銅鑄成上下兩層的幾何形獸首紋框架，下層獸首的口鼻兩側尚留有髭鬚；87GSZJ：16 牌飾上則隱約可見由五重抽象獸面紋疊置組成的裝飾，惟此器一反同組他器以青銅框示獸面輪廓的作法，而改以左右對稱的 S 形鏤空代表獸面輪廓，獸面口鼻兩側再以三角形鏤空表示髭鬚。³⁴ 至於高駢公社牌飾上的紋飾則已經是完全幾何化了。

過去曾有學者指出三星堆、二里頭 87VIM57：4 和日本美秀博物館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的原型不僅可以上溯至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和腐殖酸場墓地的鏤空銅牌飾，它們也是從哈密「原始形態」銅牌飾發展至二里頭 81YLVM4：5、檀香山藝術學院、天水博物館和瑞士玫茵堂等「成熟形態」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的「中間形態」。³⁵ 然而哈密所見鏤空銅牌飾不僅具體年代不明，其穿孔又位於窄邊一側，與三星堆和二里頭鑲嵌綠松石牌飾的佩繫方式明顯不同，能否互為比序，不無可議。此外，二里頭 81YLVM4：5 和 87VIM57：4 銅牌飾之年代分屬二里頭文化二期和四期，二者早晚關係明確，然而前述主張卻無視於此，逕將四期銅牌飾置於二期銅牌飾之前，其推論依據亦令人疑惑不解。

綜上所述，就製作工藝和紋飾構圖而言，圖 19 中的五組牌飾間彼此關聯又各具特色，其中又以第一組二里頭文化二期墓葬（81YLVM4）出土的牌飾年代最

33 李學勤，〈從一件新材料看廣漢銅牌飾〉。

34 李學勤雖曾主張本器上的紋飾是以五重變形的饕餮面組成，但他認為 S 形鏤空代表饕餮的雙目，與筆者的解讀有所不同。李學勤，〈從一件新材料看廣漢銅牌飾〉。

35 陳小三，〈試論鑲嵌綠松石牌飾的起源〉，頁 91-98。

早，匍匐獸紋各部位的表現也最為完整精緻，而後隨著時間的發展，伏獸紋愈趨鬆散簡化（如第二組），進而逐漸脫離原有的伏獸造形而轉化為多樣化的獸紋（如第三組），甚至進一步退化成僅隱約具有獸形餘韻的 U 字形紋（如第四組）或全然抽象的幾何形鏤空框架（如第五組三星堆器）。

正如西方藝術史學者龔布里希所主張的，無論對於再現（模仿）或表現（裝飾）藝術的解讀，都屬於認知心理學的範疇，故而一個地區或文化的傳統慣例（*traditional schemata*）或圖像範式（*visual stereotypes*）以及人們的心理定向（*mental set*）在圖像的認知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³⁶ 因此，與其說前述鑲綠松石青銅牌飾上不同類型的動物紋飾真實地再現了不同種類的動物形象，不如說它們是不同時期或不同文化的先民基於二里頭文化二期以來所建立的圖像範式，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定向調整與設計選擇的結果。

整體而言，從第一組至第五組牌飾的發展，應大致涵蓋二里頭二至四期以迄商代前期階段，其中各組之間，以及各組內的不同牌飾之間也具有不同程度的早晚關係。就獸形紋飾的發展邏輯而言，第二組各器應為第一組的延續，而第二組各器又略早於第三組，至於第四和第五組似乎分別是從第三組牌飾上不同類型獸形紋飾發展而來，它們開始出現的時間可能大致相當，但其中第五組三星堆牌飾的年代或已晚到商代前期。果若如此，三星堆青銅牌飾不僅是此類青銅牌飾分布的南界，也代表目前已知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發展年代的下限，它們對於說明二里頭文化網的擴張和二里頭文化的去向深具意義。

〔後記〕本文所附多幀線圖係王玉善和章筠二位研究助理協助繪製、修改或填色，特此致謝。

36 E. H. Gombrich, "Introduction," in *Art and Illu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5th rev. ed.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77), 3-25; E. H. Gombrich, "Introduction: Order and Purpose in Nature," in *The Sense of Order—A Study of Psychology of Decorative Art*, 2nd ed., 3rd imp.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94), 1-16.

引用書目

- 下靳考古隊，〈山西臨汾下靳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12期，頁4-13、97-98、102。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1981年河南偃師二里頭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1期，頁37-40、99-100。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1984年秋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4期，頁318-323、391-392。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1987年偃師二里頭遺址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92年4期，頁294-303、385-386。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精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早期青銅文化——二里頭文化專題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王金秋，〈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牌飾〉，《中原文物》，2001年3期，頁18-20、27。
- 王青，〈鑲嵌銅牌飾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5期，頁65-72。
- 王青、李慧竹，〈國外所藏五件鑲嵌銅牌飾的初步認識〉，《華夏考古》，2007年1期，頁88-93。
- 王青，〈鑲嵌銅牌飾的寓意諸問題再研究〉，《東方考古》，9集，2012年，頁223-242。
- 王青，〈二里頭遺址出土鑲嵌綠松石牌飾的初步研究〉，《夏商都邑與文化（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249-277。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三星堆遺址真武倉包包祭祀坑調查簡報〉，《四川考古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80-81。
- 朱乃誠，〈二里頭文化龍遺存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4期，頁15-21、38。
- 朱仁星，〈遺珍略影——檀香山藝術學院收藏中國文物選介〉，《故宮文物月刊》，113期，1992年8月，頁50-51。
- 李存信，〈二里頭遺址綠松石龍形器的清理與仿製復原〉，《中原文物》，2006年4期，頁92-96。
- 李學勤，〈論二里頭文化的饕餮紋銅飾〉，《中國文物報》，1991年10月20日。
- 李學勤，〈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 李學勤，〈從一件新材料看廣漢銅牌飾〉，《中國文物報》，1997年11月30日。
- 杜金鵬，〈廣漢三星堆出土商代銅牌淺說〉，《中國文物報》，1995年4月9日，3版。
- 陳小三，〈試論鑲嵌綠松石牌飾的起源〉，《考古與文物》，2013年5期，頁91-100。
- 陳洪海、格桑本主編，《宗日遺址》，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 許宏，〈二里頭的「中國之最」〉，《中國文化遺產》，2009年1期，頁61-62、65-66。
- 許宏，〈「夏王朝」考古：學術史·新動向·新思考〉，《夏商都邑與文化（二）》，頁16-17。

- 陸思賢，〈二里頭遺址出土飾牌紋飾解讀〉，《中原文物》，2003年3期，頁38-43。
- 敖天照、王友鵬，〈四川廣漢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年9期，頁76。
- 葉萬松、李德方，〈偃師二里頭遺址獸紋銅牌考識〉，《考古與文物》，2001年5期，頁40-47。
- 張天恩，〈天水出土的獸面銅牌飾及有關問題〉，《中原文物》，2002年1期，頁43-46。
- 張昌平，〈玫茵堂收藏的二里頭文化青銅器〉，《南方文物》，2014年3期，頁152-154、199。
- 趙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收入李紹明、林向、趙殿增主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成都：巴蜀出版社，1993，頁82。
- 趙殿增，〈三星堆與二里頭銅牌飾研究〉，《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21-128。
- 顧萬發，〈試論新砦陶器蓋上的饕餮紋〉，《華夏考古》，2000年4期，頁76-82。
- 大毛說玉，〈夔龍與蟾蜍——夏代綠松石青銅牌與中華民族的蛙崇拜〉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bfc5aaa0101sbjv.html，檢索日期：2015年3月2日。
- MIHO MUSEUM 編，《MIHO MUSEUM 南館圖錄》，京都：日本寫真印刷株式會社，1997。
- 朝日新聞社編，《三星堆——中國5000年の謎・驚異の假面王國》，東京：朝日新聞社，1998。
- Asia Society. *Archives of Asian Ar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8-69, XXII.
- Fogg Art Museum. *Grenville L. Winthrop: Retrospective for a Collector*. Cambridge of Massachusetts: Fogg Museum of Art, 1969.
- Garner, Harry M. and Medley, Margaret. *Chinese Art in Three-Dimensional Colour*. Portland: Asia Society for the Gruber Foundation, 1969, vol.1.
- Loehr, Max. *Relics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r. Paul Singer*. New York: Asia Society, Distributed by Harry N. Abrams, 1965.
- O'Connor, Ariel and Eremin, Katherine. "A Technical Study of Casting and Inlay on Chinese Ceremonial Weapons at the Harvard Art Museums," The 8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sian Art Museum, San Francisco, April 14, 2015.
- Poor, Robert J..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Ceramics and Jad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Introduction and Catalogue*. Honolulu: The Academy, 1979.
- Panofsky, Erwin.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enaissance Art," in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26-41.
- Siren, Osvald. *Kinas Konst Under Tre Årtusenden* (中國藝術三千年). Stockholm: Natur och Kultur, 1942-43, vol.1.
- Harvard Art Museums. <http://www.harvardartmuseums.org/collections/object/204651?position=133>; <http://www.harvardartmuseums.org/collections/object/204639?position=134>, 檢索日期：2015年3月30日。

Function and Origins: A Study of the Turquoise-Inlaid Bronze Plaques with Animal Decoration from the Erlitou Culture

Huang Tsui-mei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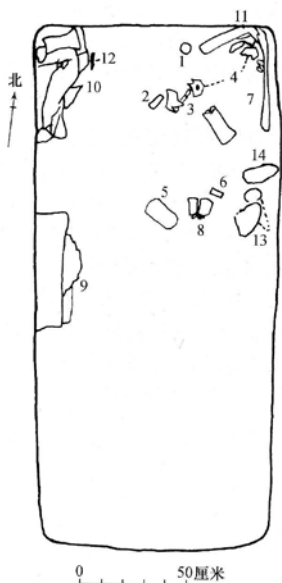
Abstract

The turquoise-inlaid bronze plaques with animal decoration that have been excavated from the Erlitou site are one of the most eye-catching material aspects of Erlitou Culture that have been recovered to date. The present study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tomb location and direction of placement for three bronze plaques with turquoise animal-design inlay excavated from Erlitou tombs to suggest their possible function. Afterwards, I examine the decorative features and form development of seventeen turquoise-inlaid bronze plaques that have been uncovered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r passed down by collectors.

The results of my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turquoise-inlaid bronze plaques were worn as decorative items on the wrist of the tomb occupants, the origins of which can perhaps be traced back to turquoise-inlaid wrist ornaments of the late Neolithic Age. As for the date of the above-mentioned seventeen turquoise-inlaid bronze plaques, they probably span the period of Phase II to Phase IV of the Erlitou Culture and up to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They can also be distinguished by order into five groups on the basis of workmanship and decorative composition. The earliest is the one in Group 1 excavated from Tomb 81YLVM4 from Phase II Erlitou Culture, the prostrate animal design inlaid on the surface also being the most complete. The rest follow chronologically as the crouched animal patterns becoming increasingly loose and simplified before finally ending with abstracted geometric forms in an openwork frame.

Keywords: Erlitou, Tianshui, Sanxingdui, turquoise-inlaid bronze plaque with animal decoration, wrist ornament, visual stereotype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81YLM4 平面图

- 1、7. 圆陶片 2、3. 绿松石管 4. 陶壶
5.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 6. 玉管状物
8. 铜铃 9~13. 漆器 12. 柄形饰

圖 1 二里頭 81YLM4 墓葬平面图
取自《考古》1984年1期，頁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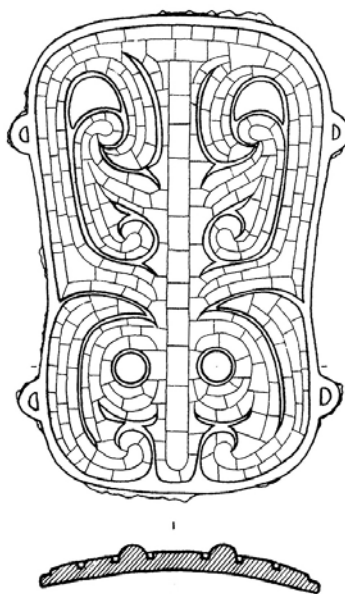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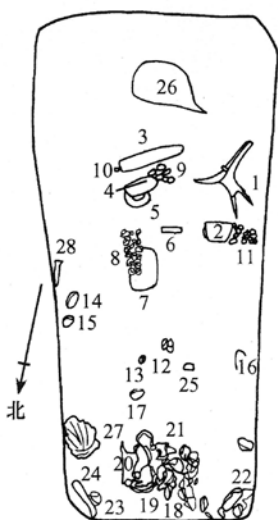


圖 2 二里頭 81YLM4 出土的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 取自《考古》1984年1期，頁38圖5-1



1. 铜爵 2. 铜铃 3. 玉圭 4. 玉刀 5. 玉戚璧 6. 玉管状物
7. 铜牌饰 8、9. 海贝 10~13. 贝 14~18、23. 圆陶片
19、24、28. 玉柄形饰 20. 陶爵 21、22. 陶壶 25. 绿松石
26. 漆盒 27. 大崩贝

圖 3 二里頭 84VIM11 墓葬平面图
取自《考古》1986年4期，頁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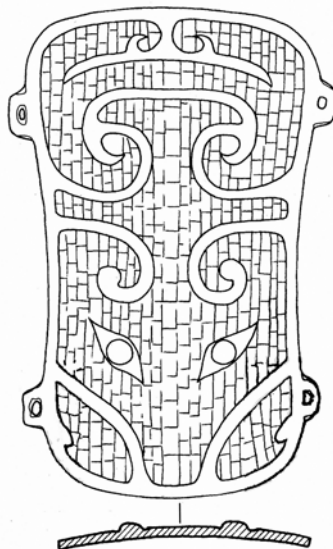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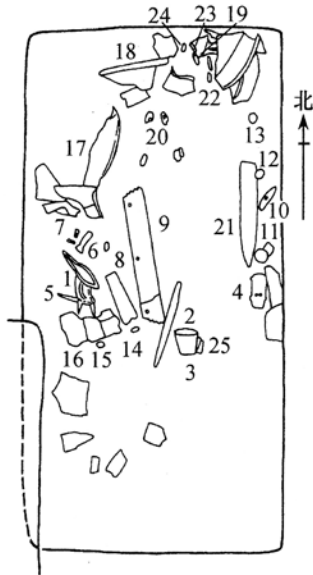


圖 4 二里頭 84VIM11 出土的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 修改自《考古》1986年4期，頁321圖6-上



M57: 1. 銅爵 2. 銅刀 3. 銅鈴 4. 銅牌
5、6、7. 玉柄形器 8. 小玉器 9. 玉刀
10. 月牙形玉器 11~15. 圓陶片 16. 陶圓腹罐
17. 陶卷沿盆 18. 陶簋 19. 陶盃 20、24. 貝壳
21. 玉戈 22、23. 綠松石珠 25. 玉鈴舌

圖 5 二里頭 87VIM57 墓葬平面圖
取自《考古》1992 年 4 期，頁 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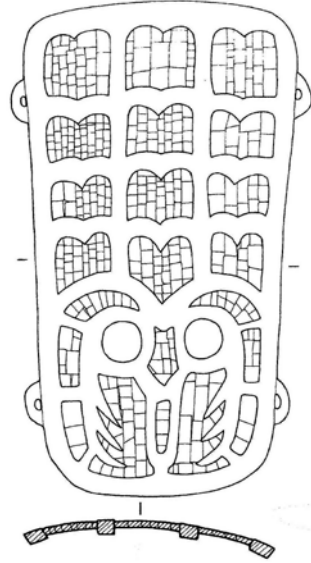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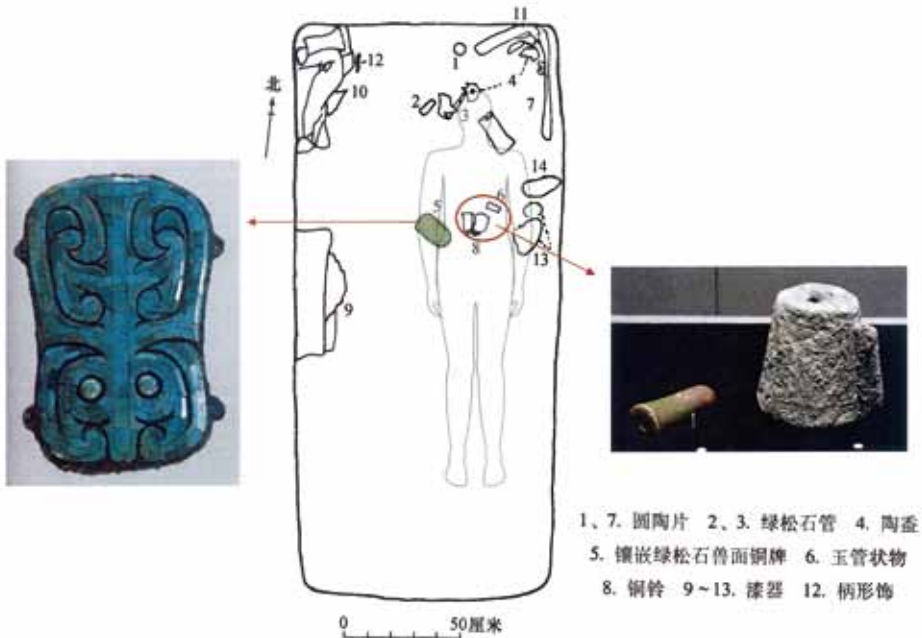


圖 6 二里頭 87VIM57 出土的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正反兩面 取自《考古》1992 年 4 期，頁 296 圖 2-1



1、7. 圓陶片 2、3. 綠松石管 4. 陶盃
5. 鑲嵌綠松石兽面銅牌 6. 玉管狀物
8. 銅鈴 9~13. 漆器 12. 柄形飾

圖 7 二里頭 81YLV M4 墓主躺臥位置模擬以及該墓出土的銅牌飾和銅鈴 左：《考古精華》，圖 94-1 中：《考古》1984 年 12 期，頁 37 圖 2 右：筆者自攝（人形輪廓為筆者添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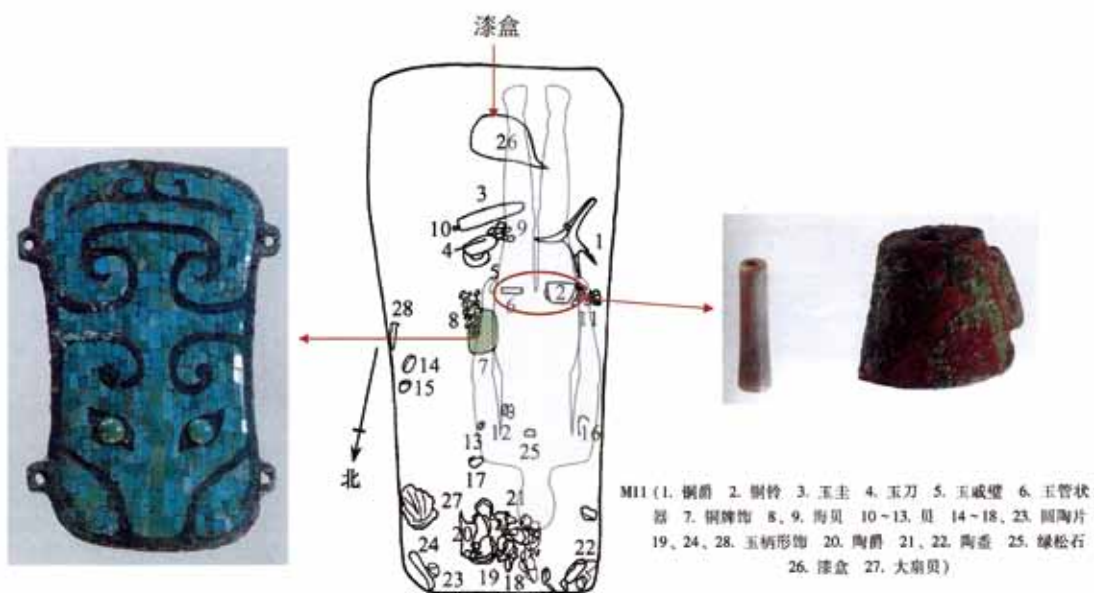


圖 8 二里頭 84VIM11 墓主躺臥位置模擬以及該墓出土的銅牌飾和銅鈴 左、右：《考古精華》，圖 94-1、2 中：《考古》1986 年 4 期，頁 319 圖 3（人形輪廓為筆者添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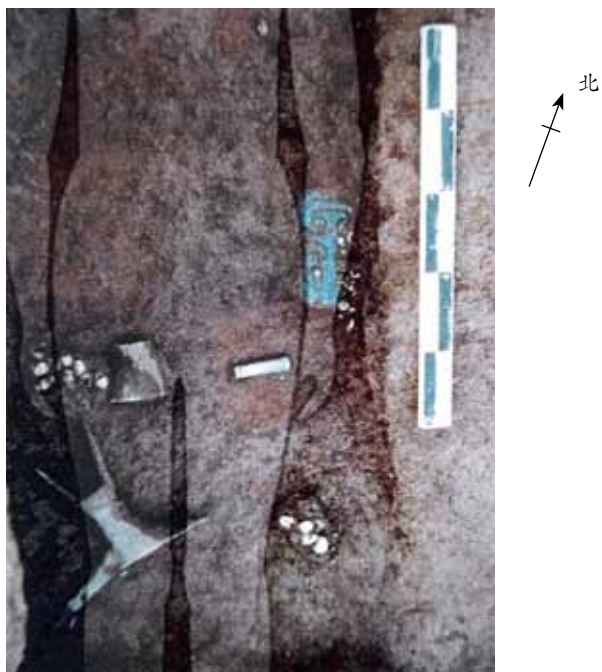


圖 9 二里頭 84VIM11 墓葬內局部彩圖 取自《考古精華》圖 94-3（人形輪廓為筆者添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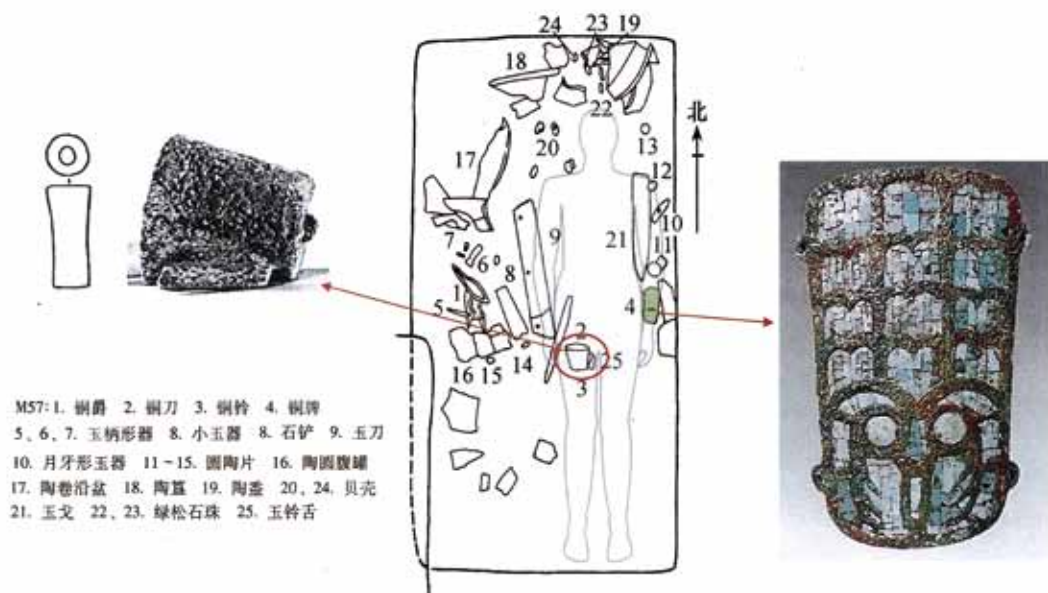


圖 10 二里頭 87VIM57 墓主躺臥位置模擬以及該墓出土的銅牌飾和銅鈴 取自《考古》1992 年 4 期，頁 295 圖 1-D、頁 296 圖 3-5、圖版 1、圖版 2-2（人形輪廓為筆者添加）



圖 11 陳列於甘肅天水博物館中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筆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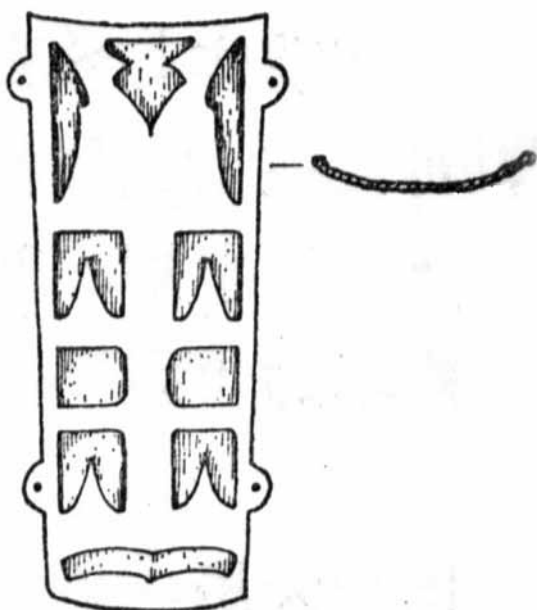


圖 12 高駢公社出土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取自《文物》
1980年9期，頁76圖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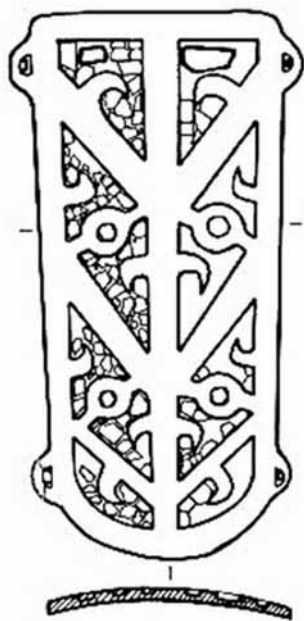


圖 13 倉包包出土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取自《三星堆與巴蜀文化》，頁81
圖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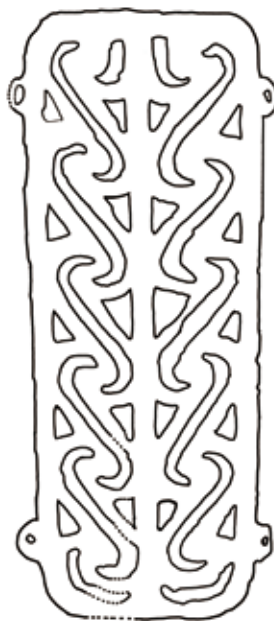


圖 14 倉包包出土的青銅牌飾 據《三星堆——中國5000年的謎·驚異的假面王國》圖151繪製



圖 15 宗日遺址 322 號墓及墓主左手佩戴的鑲綠松石腕飾
取自《宗日遺址》，頁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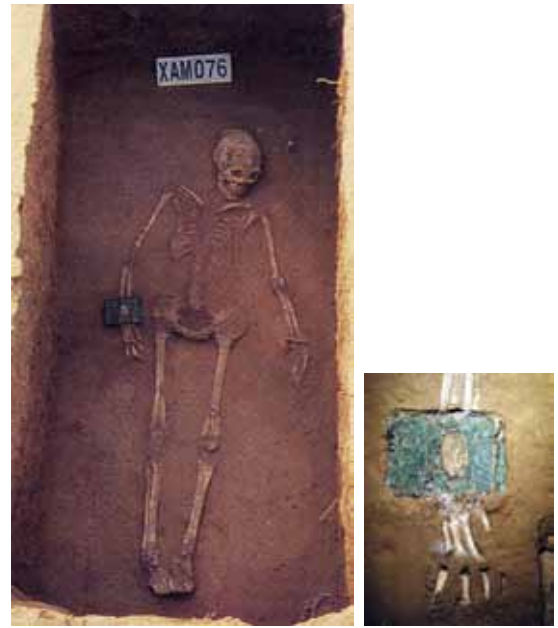


圖 16 下靳遺址 76 號墓及墓主右手佩戴的鑲綠松石腕飾
左：取自《文物》1998 年 12 期，封彩 1 右：筆者自攝



圖 17 陶寺文化下靳墓葬出土的鑲綠松石腕飾 腕飾內部尚留有墓主手骨 筆者攝於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陳列室



圖 18 龍山文化日照兩城鎮 33 號墓及墓主左手佩戴的鑲綠松石腕飾 樂豐實教授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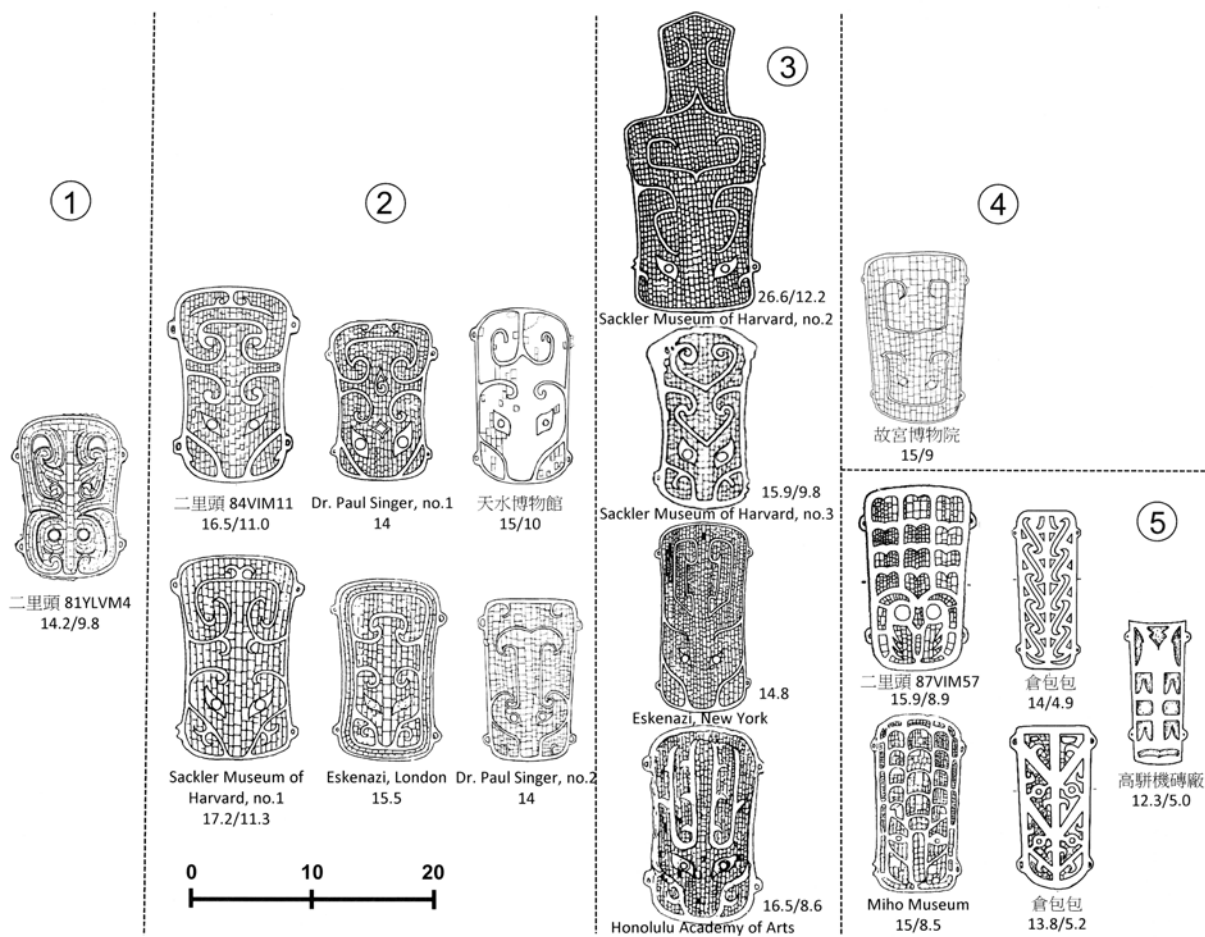


圖 19 五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及其發展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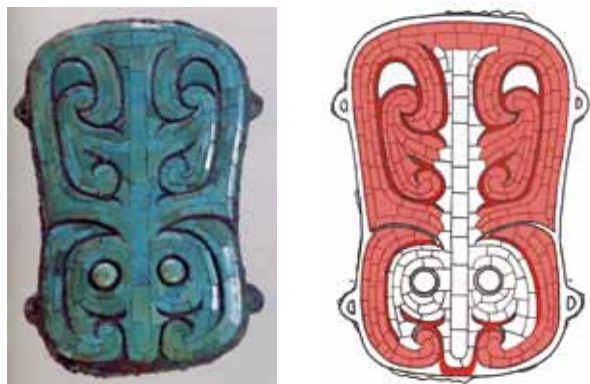


圖 20 二里頭 81YLV4 出土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考古精華》圖 94-1 右：據《考古》1984 年 1 期，頁 38 圖 5-1 填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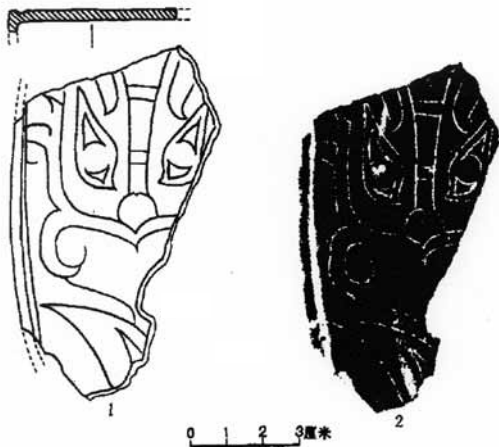


圖 21 新砦遺址出土的陶器蓋上的動物紋飾 取自《華夏考古》2000 年 4 期，頁 76 圖 1



圖 22 二里頭 84VIM11:7 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考古精華》，圖 94-1 右：據《考古》1986 年 4 期，頁 321 圖 6 上修改及填色



圖 23 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藏 1 號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Harvard Art Museums/Arthur M. Sackler Museum, Bequest of Grenville L. Winthrop, 1943.52.45；Photo: Imaging Department ©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右：據《中國早期青銅文化——二里頭文化專題研究》，頁 140 圖 6-3 填色



圖 24 保羅辛格醫師收藏 1 號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夔龍與蟾蜍——夏代綠松石青銅牌與中華民族的蛙崇拜〉 右：據《中國早期青銅文化——二里頭文化專題研究》，頁 140 圖 6-6 填色



圖 25 倫敦古董商 Eskenazi 收藏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圖 1 右：據《中國早期青銅器文化——二里頭文化專題研究》，頁 140 圖 6-4 填色



圖 26 天水博物館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夔龍與蟾蜍——夏代綠松石青銅牌與中華民族的蛙崇拜〉 右：據左圖繪製及填色



圖 27 保羅辛格醫師收藏 2 號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夔龍與蟾蜍——夏代綠松石青銅牌與中華民族的蛙崇拜〉 右：據左圖繪製及填色



圖 28 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藏 2 號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Harvard Art Museums/Arthur M. Sackler Museum, Bequest of Grenville L. Winthrop, 1943.52.46；Photo: Imaging Department ©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右：據《中國青銅器文化——二里頭文化專題研究》，頁 140 圖 6-10 修改及填色



圖 29 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藏 3 號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Harvard Art Museums/Arthur M. Sackler Museum, Bequest of Grenville L. Winthrop, 1943.52.44；Photo: Imaging Department ©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右：據《中國早期青銅器文化——二里頭文化專題研究》，頁 140 圖 6-9 修改及填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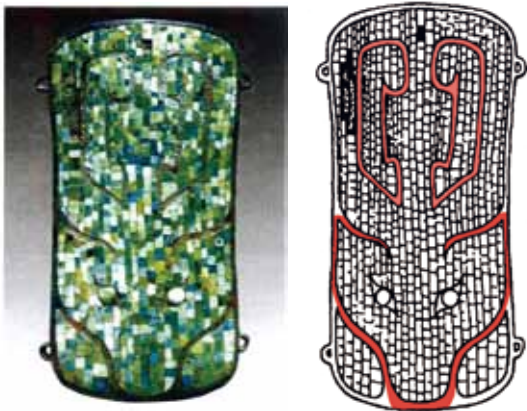


圖 30 瑞士玫茵堂藏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南方文物》2014 年 3 期，彩圖
右：據《中國早期青銅器文化——二里頭文化專題研究》，頁 140 圖 6-8 填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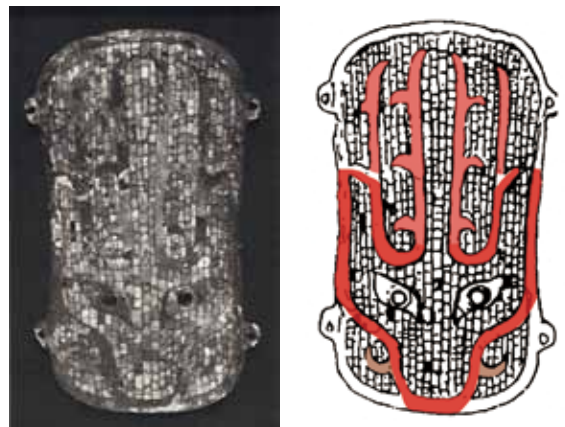


圖 31 檀香山藝術學院藏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Ancient Chinese Bronzes, Ceramics and Jad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Introduction and Catalogue, fig.13
右：據《中國早期青銅器文化——二里頭文化專題研究》，頁 140 圖 6-7 填色



圖 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右：據左圖繪製及填色



圖 33 二里頭 87VIM57：4 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考古》1992 年 4 期，圖版 1
右：據《考古》1992 年 4 期，頁 296 圖 2-1
填色



圖 34 日本美秀 (Miho) 博物館藏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MIHO MUSEUM 南館圖錄》，頁 167 圖 77
右：據《中國青銅器文化——二里頭文化專題研究》，頁 140 修改及填色



圖 35 三星堆倉包包 87GSZJ：36 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三星堆——中國 5000 年的謎·驚異的假面王國》圖 150 右：據《三星堆與巴蜀文化》，頁 81 圖 3-2 填色



圖 36 三星堆倉包包 87GSZJ:16 鑲綠松石青銅牌飾
左：《三星堆——中國 5000 年的謎·驚異的
假面王國》，圖 151 右：據左圖繪製及填色